

貨幣信用理論叢書

蘇聯貨幣流通與信用

卡滋洛夫著 朱紹文譯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出
版

貨幣信用理論叢書

蘇聯貨幣流通與信用

卡滋洛夫著 朱紹文譯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出版

蘇聯貨幣流通與信用

目 錄

第一章 國民經濟轉向和平復興期中的蘇維埃貨幣

一、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與貨幣政策的課題.....(一)

二、穩定通貨計劃.....(一七)

三、穩定蘇聯盧布對社會主義勝利的意義.....(三一)

四、切爾文的發行——幣制改革的開端.....(三八)

第二章 國民經濟轉向和平復興期中的蘇維埃貨幣

一、幣制改革對國民經濟復興期中克服困難的意義.....(五三)

二、幣制改革的完成.....(七〇)

三、蘇維埃貨幣制度與資本主義貨幣制度的根本不同.....(八七)

四、復興期末期蘇維埃貨幣的作用.....(九二)

五、幣制改革後為進一步鞏固蘇維埃盧布的鬥爭.....(九八)

第三章 社會主義工業化鬥爭期中的蘇維埃貨幣

一、向社會主義工業化邁進期中的困難與貨幣政策的任務	(一〇九)
二、為降低價格而鬥爭	(一一一)
三、農產品市場中推行的物價政策	(一三六)
四、積累問題的解決、及加強財政、貨幣、信用制度的計劃性問題	(一四九)
第四章 農業集體化鬥爭期中的蘇維埃貨幣	
一、過渡到社會主義時代與蘇維埃貨幣的作用	(一六五)
二、開展蘇維埃商業與貨幣流通	(一七五)
三、信用改革	(一九三)
四、進一步加強財政工作	(一一一)
五、商品交易信用制度的變更與貨幣流通的計劃化	(一一五)
六、克服改造期中的困難與進一步加強盧布	(一一〇)
第五章 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功與實施新憲法期中的蘇維埃貨幣	
一、蘇聯發展的新階段	(一三八)
二、廢止配給制度與展開蘇維埃商業	(一四二)

- 三、關於加強經濟核算制的各種措施.....(二五二)
- 四、貨幣經濟的發達與進一步加強盧布的努力.....(二五六)

第一章 國民經濟轉向和平復興期中的蘇維埃貨幣

一、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與貨幣政策的課題

爲了轉向和平建設，加強工農階級間的經濟聯盟起見，必須對經濟建設的各種方式進行若干變更；對於活躍農村經濟，增加農業產品方面——當然這對復興工業也是必要的——祇有在某種程度上，准許農產品的自由交易，以喚起農民對經濟的關懷，才有可能。

自然，在起初由於允許市場關係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資本主義經濟成份的活躍和成長。不過，由於勞動人民階級掌握了政權的關係，隨着工業與農業的復興，才可以有力量驅逐資本家份子，才可以逐漸地創造出作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强大工業。

列寧在解說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就說道：

「在實際上，新經濟政策當中存在有比之我們以往的經濟政策還要陳舊的東西。」（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三十七頁）

不過，列寧在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上曾說明：從餘糧收集制改變為糧食稅制的決議中所規定的整個經濟與市場和商業的具體關係，是新經濟政策之新的地方。

『現在任務已經不在於從剝削者手中去奪取的問題，而是在於提高計算、管制和勞動生產力及勞動紀律，我已經在一九一八年的三月和四月間說過這件事，不過，對於我國經濟與市場和商業間究竟具有何種關係這一點尚未論及。』（同上、六十二頁）

餘糧收集制被租稅制代替了，這就是說，農民有權可以自由地在市場上出賣他的一切的剩餘生產品。從而國家在商業中的獨佔也廢除了，賦與了商業以一定程度的自由。

政府在起初雖然給予市場交易以一定程度的自由，不過還是加以相當限制的。第一、與工業品交換為目的的剩餘農產品的自由販賣，是祇允許在「地方的交易」範圍之內；第二、國家與農民經濟間的商品交易須要根據商品交換的原則。這些政策的目的是在於要限制私人資本的作祟。同時其所以不得不試行商品交換的方法，其原因是由於經濟和通貨全面地破壞了的結果，當時國家手中所僅有的一點工業生產品，必須最有效地在市場來運用。

商品交換與糧食稅同樣，是一九二一年整個國民經濟計劃的最重要的樁樑。

一九二一年——二二年度的列寧的經濟計劃是運用租稅和商品交換的方法，來保證國家手中掌握最低限度的必要物資，確保燃料，發展交通，和促進優秀企業的生產。該年度的經濟計劃雖然不可避免地要依靠市場，但是，它是與市場的盲目性背道而馳的，它是在鞏固國營企業下的秩序井然的一種退却。

那麼，在上述的經濟政策與經濟計劃之下的貨幣政策，又將是怎樣呢？

商品交換政策決不是排除貨幣流通的政策。允許市場的存在它是擴大貨幣流通的，它是加強了貨幣在國內經濟中的意義，商品交換政策它是創造堅強的貨幣流通的基礎。早在第十次黨代表大會席上，列寧在說明實施糧食稅的時候，曾指出了貨幣流通的重要性。

『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貨幣流通是最能檢查國內交易是否圓滿地在進行的手段，當交易不順的時候，在貨幣中就要發生不要的紙幣。』（同上第二十六卷、二四三頁）列寧在有名的「勞動國防會議的罪過」中，也敘述了商品交換的道理，指出了商品交換對於貨幣流通上的意義。

『第二、商品交換是工業和農業之間正常的相互關係的檢查器，同時也是創造出並

可能發揮貨幣制度之正確作用的一切活動的基礎。」（同上、三六九頁）

所以，根據列寧的意見，商品交換絕不是取消貨幣流通的，毋寧它是創造健全貨幣制度的基礎。

列寧認為通過糧食稅和商品交換創造出了最低限度的必要的食料品，這是恢復貨幣流通的第一步，是恢復正確活動的財政制度的第一步。（同上，四一八頁、四三三頁）

像由羅夫斯基這樣的反革命的「學者」，他所寫的：所謂商品交換是實物交換，誰也沒有想到過貨幣經濟的。從這一點看，他們的所謂「科學性」和「客觀性」究竟是些什麼東西，自然是自明了。

在當時，政府企圖通過商品交換直接地在市場上與小商品生產者聯繫，「多少帶有社會主義性地」（列寧語）使社會主義工業的生產品與農產品相交換。（見註）

（註）從商業中完全排除私人商人存在的提案為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放棄了。（見第五次俄羅斯共產黨大會議事錄）

然而，商品交換是失敗了，它的原因在那裏呢？新經濟政策首先助長了小規模手工業的發達，這種工業才是最早適應於市場的。擔負主要商品交換任務的消費合作社，是

不適應於當時的商業的。同時，要很快地將消費合作社從配給制度的方式中，改變爲以商品交換形式的複雜的商業活動的方法，也完全是不可能的。私人商人很容易接近原料的販賣者和購買者。政府的採購機關就不得不依賴私人商人。在一九二一年七月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的代表會議上，就已經採用了這個決議：即是一部份的也好，必須從商品交換轉移到商業的買賣。商品交換比之糧食稅還帶來了壞的結果。十一月一日糧食稅提供了五七·四百萬布特的穀物，而商品交換僅提供了四·一百萬布特。

黨記取了這個經驗，於是在一九二一年列寧在莫斯科縣黨會議席上作過這樣的談話：

『一九二一年春天以來，許多的佈告、決定，許多的論文，一切的宣傳，一切的法規都促進着商品交換的發達。不過，這個概念究竟是指什麼意思呢？

假使可以這樣說的話，這個概念所意圖的建設計劃是什麼樣的東西呢？它主要是意圖：採取一些社會主義的方法，使工業生產品與農業生產品相交換，通過這種商品交換來復興作爲社會主義組織的唯一基礎的大工業。然而，其結果如何呢？現在我們實際上已經完全知道它的結果如何，同時在一切的刊物中也很明顯的承認商品交換是失敗的。不

過，這個失敗是在於它成爲買賣而出發的意味下是失敗的……我們的退却是不充分的，我們必須承認從國家資本主義轉移到國家來調整買賣和貨幣流通的場合，是須要再向後方退却一點。在商品交換中什麼也沒有做出來，而私人市場反較我們有力得多了。因此，代替了商品交換發生了普通的買賣即是商業。

必須努力去適應商業！要不然，買賣和貨幣流通的盲目性就要來反抗你們了！」

（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六七、六八頁）

因此，很明顯的，我們不能說商品交換的失敗，是由於商品與商品交換的困難，或者說是規定各種商品間的相互關係的「等價委員會」的活動太壞的結果。如果問題祇是這一點的話，那麼，我們祇要規定各種商品的價格就可以實行商品交換了。因爲通過這樣的方法，對於商品交換的性質並沒有變化的（例如一九一八年那樣）。然而，如上所述，商品交換並不是排除貨幣流通的呀。

所以，問題在於須要轉移到採取買賣的方式這件事上。

商品交換的失敗這件事說明了，國營部門與農民經濟之間，也必須轉移到採取買賣的方式，即是轉移到市場和通貨調節的方向去。這也就是說明，國營工業與小商品農民

經濟之間，還必須暫時的允許個人的仲介商人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就必須要有更進一步的退却不可了。

轉移到調節通貨去的必要，就不得不促進了經濟的貨幣化的過程。

除去國營企業的勞動者和職員以外，國家廢止了對一切勞動者提供糧食的義務（一九二一年九月六日的佈告）。其後，除去將自己的全部生產品提供給國家的企業外（像軍需工業、金屬工業、和一部分燃料工業），其他一切的企業不接受國家的供給（一九二三年二月六日佈告）。在一九二〇年接受配給的有三千八百萬人，而到了一九二二年初，就減到了八百萬人。

國家的採購機關也被許可了在自由市場上，通過商品交換或市場價格的購入方式，買進原料和手工業製品（一九二一年十月四日佈告）。

從供給國家生產品中解放出來的企業，被允許在自由市場上出賣自己的生產品（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上述一連串的規定，完全是爲了鞏固社會主義工業起見而利用私人商業；完全是爲了通過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對私人商人的競爭來自己學習做買賣。

既然允許自由買賣的存在，那麼就要求貨幣交易的自由。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公佈了在俄羅斯共和國內流通着的貨幣，「廢止個人及團體手中所應有的限制額」的法令（一九二一年度法令集，第五二號）。同時用法律規定存款和匯兌業務的完全自由。由於國營企業採取經濟核算制，故對人民的服務和所提供的生產品，就必須要有代價。於是在七月九日規定了支付鐵道輸送費用制，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五日、九月十六日及十一月二十八日又規定了除去對勞動工人和職員提供實物供給外，國家對個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都需要支付代價。

由於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其本身就已經意味了恢復到嚴格的計算與管制政策，因此就說明要有實施經濟核算制的必要。

列寧在第七次莫斯科縣黨會議席上，就曾說到有若干的企業已經採用經濟核算制，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現象。

在第九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上，也在它的決議中說到：受國家供給的也好，不受國家供給的也好，所有的國營企業必須根據經濟核算制原則來經營。（參照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九次全俄蘇維埃大會的決議「關於新經濟政策與工業」中，問題的第三項

「關於國營工業諸問題」。)

經濟核算制是無產階級專政管理社會主義企業的最重要的手段。這將會永久不失去它的重要性的。不過，經濟核算制的作用是隨着各個階段中階級鬥爭的情況而變化的。在當時，經濟核算制的階級的意義是通過實施真正的經濟核算制，才能够在市場上戰勝私人資本，祇有通過實施真正的經濟核算制，才能够成功地戰勝想犧牲國營企業的資金而賺錢的私人商人的企圖。私人資本利用國營企業經營上的一切不靈活和缺陷，來動搖國家的財產。

上述的情況，要求急切地變更一切財政和貨幣政策。

列寧已經在新經濟政策的開始，就提出了根據商品交換來鞏固蘇維埃盧布的課題。由於從商品交換轉移到商業買賣，這件事更使如何鞏固盧布的問題尖銳化起來。

列寧在『現在及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黃金的意義』論文中，曾強調商業爲了掌握鎖鏈的全部，就不得不盡『全力來掌握它的』經濟上的一個「環節」。（見列寧全集、第廿七卷、八二頁）然而、爲了活躍國內商業起見，必須要有鞏固貨幣的政策，同時，在另一方面，祇有在商業方面成功的發展，才是盧布安定的基礎。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斯大林指摘商品市場的發達時說道：

「所以，如果不去調節通貨，改善盧布市場，那我們的經濟工作，不問對內也好，對外也好，將完全陷於兩足跛行。」（見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真理報）。

工農階級的經濟聯盟，對私人資本的管制，組織國營企業中的正確的經濟核算制度，提高實際工資等等課題，就要求為鞏固蘇維埃盧布而鬥爭。

列寧所提議而被第九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所通過的『關於經濟活動諸問題的訓令』中，以最短期間內收到『對農民的供給事業是確實有實際的成功』（這祇有通過商業的發達才能達到）作為主要的課題。在這個訓令中列寧這樣寫道：

『第九次蘇維埃大會所交給財務人民委員會的任務——以最大努力和最迅速的方法縮小紙幣發行額，然後再求中止其發行，根據金本位制以恢復正常的通貨，財務人民委員會的活動必須服從這個目的。必須毫無遲疑地切實執行以租稅代替紙幣的發行。』（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一四二頁）。

所以，列寧很明白地說明了減少發行額與商品交易的活潑化和改善對農村的供給之

間的相互關聯。

爲了實行減少發行額這個任務，首先就要求國家預算的健全化。因爲，國家預算的情況如何，是紙幣增發的基本原因。

因此，就必須減少支出（減縮對國家機關的支出）、建立財源、設立稅收機關，就需要將當時次要的支出移轉到地方，就必須確立地方預算使地方當局去考慮財源。這許多政策都在一九二一年中實施了。

一九二一—二二年度財政政策中最重要的成績是開始調整預算。不過，要注意的就是在着手調整預算的時候，對於違反財政紀律的，誤解財政爲陳舊的現象的錯誤，必須進行決定性的鬥爭。

關於這個問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採取了特別決議，意思是說這種見解是會阻礙財政制度的發展。（見註）

（註）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中，有這樣的記載：「本會必須想一想過去賦與財務人民委員會以許多上述重大任務的時候，而在過去革命的三年間，即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間，蘇維埃官廳和企業方面，存在一種錯誤的見解：認爲財務人民委員

會這個機關是非常陳舊的而須要清算的一個機關，這種見解使得各個政府機關輕視財務人民委員會堅持國庫的利益，和擁護國庫利益的政策，因此，財務機關在實行新財政政策的時候，就發生很大的障礙。」（見一九二一年法令集、六九號）。

財務人民委員會的財源動員工作，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間，還不能把國家從紙幣發行中解放出來。其原因是由於（一）財務機關的工作和組織的不完備（當然，財務人民委員會已經完成了很大的任務）；（二）是由於蘇維埃經濟基本的一般的情況。

經濟情況是非常不好，一九二一年的飢荒更造成了嚴重的局勢。一九二二年的八個月間，貨幣稅收和國家財產的收入佔全支出額的百分之一一·三，糧食稅佔百分之四〇·八，紙幣發行佔百分之四〇·七。這個現象說明了兩件事：（一）預算還有相當的程度是實物的，（二）在貨幣收入中紙幣發行約佔百分之八十。

從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起到次年四月一日之間，貨幣流通額從一六·八六〇億盧布增加到八一·八〇〇億盧布，即增加了四十八倍以上。在這個年度內物價騰貴了七十倍。

因此，紙幣發行的效果益見其微小。在一九二二年的三月與它的前一年的三月相